

# 马克思多民族国家思想的基本进路及其中国意义

文/邹诗鹏

现代中国一直在寻求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资源。在本文看来，马克思在民族的理解上批判和超越了西方近代启蒙哲学以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民族国家观及其实体化的政治民族概念，也自觉批判了自由主义性质的单一民族国家以及帝国主义性质的超民族国家，形成了面向人类解放的多民族国家观。这一思想强调东方民族整体性的独立解放及其现代化发展，也内在地接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导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实践，具有理路上的优越性及必然性，值得深入探析。

## 近代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对民族的理解

启蒙运动显化了国家民族。在英法启蒙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在回应浪漫主义及其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与实体性政治民族的内在关联，致力于构建德意志国家民族及其民族精神概念，进一步巩固了近代哲学的民族自觉，近代哲学有关民族的论域也在黑格尔那里进一步拓展并深化。黑格尔殚精竭虑地致力于构建德意志国家民族，其意图值得肯定，但这在当时的德国几乎难以想象。在浪漫主义执念于某种徒具世界主义形式但实质只是族群性民族及其地方性的自治观念，并且直接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其他人物时，黑格尔明确建构并且论证了超越族群性民族的国家民族概念。这本身就是对有可能走向现代世界的德意志民族的最大贡献。但在这一过程中，黑格尔也把在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欧洲中心主义推到了极端，把已经存在于近代哲学的种族主义与国家精神关联起来，黑格尔将德意志国家精神看成是世界精神的顶峰，实际上从理论上开出了帝国主义。这一思想又为在其先行否定掉历史合理性的东方社会及其民族中实行殖民化及其种族主义作了理论铺垫。通过自觉批判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开放了为黑格尔所否定的东方社会及其民族，并通过吸纳人类学民族学成果，通过对东方社会及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索，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直接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多民族国家思想。

## 马克思的多民族国家观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民族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明确反对弥漫于黑格尔国家哲学以及当时德国哲学主流的某种“纯粹民族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开放以及与人类共同体的通融，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而某一民族自身又完成不了调整，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对马克思而言，对落后德国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当时德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而青年黑格尔派以及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所强调的“民族精神”，正是如此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是在更低哲学水准上呈现出来的“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在从黑格尔式的伦理国家共同体走向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中，在其确立世界公民及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巩固对德国民族主义的批判。

在批判浪漫主义之后，马克思在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展开了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把在黑格尔那里确定了的国家民族再度问题化，并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将族群与种族带入理论分析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中。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性分析，使得马克思不限于犹太人问题本身，而是置于现代性批判视野，这意味着马克思不限于族群性民族来把握民族性，而是将阶级分析引入民族分析的基本格局与思路。马克思抓住德国的落后制度不放，在他那里，作为副本批判的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从属于对德国国家制度的批判即主本批判。基于客观精神所建构的民族精神，总归是观念论的，是想象的德国现实，也是对德国真实历史的无视，而实际存在的保守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德国的政治批判和政治解放必须解决的问题。

与之对应，对民族的理解也不再是从属于民族国家的实体性政治民族，而是社会关系与社会实在的民族。在马克思那里，民族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从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政治民族中解放出来，实现面向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的民族共

团体建构。伴随着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展开了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市民社会批判，同时也展开了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尤其是单一民族国家观的批判。

单一民族国家（Single Nation, Single State）是合于古典自由主义及其早期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类型。在当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指单一民族国家。但马克思显然反对上述本质上已经资本主义化的民族国家观。其对古典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学的批判，清晰地显示他并不认同所谓民族国家观念。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及其历史主义的批判，对斯密及李斯特等为代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及其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即包含着对民族国家观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斯密带有浪漫主义及历史主义倾向的地产占有制思想，将其与狭隘的“祖国”意识相提并论，马克思称后者乃是“狭隘的民族性”。这里，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延续了浪漫主义及其民族国家的狭隘民族国家观。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既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式的单一民族国家，也不可能如黑格尔那样建构德意志国家民族（实是德意志帝国），因此，民族国家的建立最多只是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是在下一阶段的社会解放与人类解放必须扬弃的手段。德国的出路，在于通过新的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从而将德国古典哲学所创造的人类解放的精神体现出来。

1848年，《共产党宣言》面世，这一年的欧洲革命也迎来了“民族之春”，民族主义成为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并催生了激进民族主义。这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将在更为宽广及革命性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关注民族问题，共产主义及其国际主义必须应对欧洲正在兴起的激进民族主义，超越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地域狭隘性，东方民族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理论意识。19世纪50年代之后，欧洲的民族国家逐渐由单一民族国家发展为多民族国家，并在19世纪70年代形成以多民族国家为主要形式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单一民族国家。但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单一民族国家观的批判已经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出了垄断资本主义。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刚刚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即在垄断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形成（或巩固）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并很快滑入帝国主义及其

超民族国家观，超民族国家运用的仍然是单一民族国家观，而种族主义倾向更加显著。马克思对种族主义持十分明确的批判态度。针对当时颇有市场的格宾诺种族主义的作品《论人类不平等》，1870年3月，马克思在致拉法格夫妇的信中明确写道：“他写这本书主要是要证明，‘白种人’是其余人种的上帝，而‘白种人’中的名门望族自然又是精华中的精华。……不管怎么样，他尽管仇视‘黑种人’（对这样的人来，认为自己有权鄙视别人始终是他们得到满足的源泉），却宣称‘黑人’或‘黑色血统’是艺术的物质源泉，而‘白色民族’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取决于这些民族间‘黑色血统’的混合。”

种族主义批判，置于民族国家范畴，则是对超民族国家及其帝国观的批判，实际上，正是种族主义导致多民族国家迅速滑向超民族国家。欧洲多民族国家体系并非和平演进，而是充满冲突与隔离，尼采则评价这场“民族主义疯癫”乃是“在欧洲各民族之间造成的病态的疏离”，其结果总是诉诸战争。激进民族主义下的民族国家，很快便走上超民族国家亦即帝国主义极端。正如帝国主义乃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模式的升级版，超民族国家同样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升级版，并且是让殖民地从属于帝国——宗主国及其国家民族的民族沙文主义。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等社会政治思想的批判及其展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历史地指向东方社会。从价值立场上，马克思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在马克思那里，欧洲民族国家与欧洲资产阶级具有同构性，因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历史性质及其局限性的判定，及其蕴含的欧洲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批判，也指向于对东方民族的价值关怀。马克思十分关注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强调应尊重东方民族对于现代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正是其势力拓展到庞大海外殖民地亦即东方世界的垄断资本主义，使得马克思的目光更为自觉地从“西欧小小角落”投向幅员辽阔并受西方世界压迫的东方世界，并且开创了一个有别于现当代西方哲学民族视野及其论域的东方民族论域。

### 马克思多民族国家思想何以通向现代中国

现代性的自我认同，表明民族性在西方的确立，这也是西方自我意识哲学经过长达数个世纪发展的文化结果，但这个认同仍然还只是西方人

的自我认同。在西方现代性思想看来，只有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才能够形成经济、政治与文化同构一体的现代性系统。也正是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粘连，使得西方现代哲学更加难以正视非西方的民族自觉问题。在强势的现代性逻辑下，非西方的民族性越来越成为问题。正因为迄今为止仍延续着的民族理论的西方强势背景，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需要，我们今天尤其需要彰显马克思东方社会及其民族理论。当今中国正在展开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必然表达，更是回应当今加速演进的全球化变局的内在需要。

关键的问题显然在于，非西方民族国家尤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实践，本身就要求超越西式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民族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立与解放。因此，必须要真正把握马克思所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思想，自觉摆脱西式民族国家逻辑，在重构的世界历史结构及其现代性理论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人类民族共同体（Community of Human Nation），论证经现代转化所形成的非西方的民族及国家的主体性及其族群多样性，凸显其民族特征，进而确证非西方民族的国家民族建构及其主体性。

生长于西欧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欧之外的东方世界谋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思想资源与历史依据，其原因蕴含在历史演进的理路之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东传过程，不仅渗透并主导了非西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以及现代性自西向东的转化，也积极地启发和引导着非西方尤其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以及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建。马克思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超越了单一的西式现代性及其世界历史时代，也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又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西式资本主义及其文明方面，进而将现代性与西方化、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作为世界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意义上定位未来社会，从而推进非西方世界的现代社会转变及其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

在全球化背景下超越西式现代性及其既定的西式世界历史与民族国家模式，显然必须将非西方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性及其多民族国家结构，以主体的方式摆进世界历史及其现代重构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东方民族的特征，但其对西方民族国家及其民族观的批判与分析，本身

就有利于凸显东方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并有利于东方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

近代以来，面对西式民族国家及其帝国逻辑的扼制及挑战，面对保种图存、民族复兴的抉择，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必须上升到政治民族及其国家民族。在基于自身封闭的天下体系已不可能完成民族共同体的现代转变，与此同时无论从权能还是从内在理路上都不可能诉诸西式民族国家及其民族共同体逻辑的境遇下，现代中国历史性地进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所构想的世界历史空间。马克思的民族及其民族共同体理论，本身又开放了一条非西方国家民族通过反叛西式民族国家从而实现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正是通过内在地吸纳马克思主义民族及其多民族国家资源，并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现代中国才解决了中国多民族国家之现代重建这一历史性课题，基本完成中华诸民族面向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状况下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并保有绚烂多姿的多民族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

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重大特征，就是其多民族既非单一国族国家意义上的，更非多国族国家意义上的。将中华民族多族群中的任何一个族群或民族看成是单一国族，都是巨大的糊涂与错误。在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中，中国由自身的天下体系、王道治理、朝贡体制以及夷夏之别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欧亚大陆巨大的东亚地缘及政治格局下，在以黄河文明为中心展开的文明辐射圈中，形成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宗教冲突及其民族隔离的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传统。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渊源及其生成演进、绵延持续的结果。就此而言，悠久的中华民族有理由作为国家民族，与美利坚、俄罗斯、法兰西、德意志、不列颠、意大利等并存于世，但中华民族之作为国家民族的建构，又有着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以及晚近以来的多国族国家不一样的政治逻辑。

国家治理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传统表明，其现代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国家民族的建构高度统一起来。统一多民族国家，既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基础与前提，更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基与前提。<sup>⑤</sup>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摘自《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